元好问诗歌中的聊城书写

王群丽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元好问被羁管聊城六年，家国之痛与身世之悲几乎贯穿他聊城生活的始终。他对聊城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甚少留意，所交往的也主要是同样寓居聊城的旧金士人。对旧金文人精神意绪、生活状态的书写是元好问诗歌聊城书写的主要内容。但元好问在聊城得到地方长官冠氏赵侯的关照，也受到纪园主人的热情款待，周良老的为官处事理念也引起他的共鸣，这使他的诗歌有对聊城“人美”的书写，并由“人美”进一步发现了“物美”。不论是“杏花尊酒”的旧友还是“杏园春”的新谊，元好问的聊城书写中，风物之美都有浓重的人情之美的痕迹。

关键词：元好问；诗歌；聊城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1-0131-07

收稿日期：2024-11-16

作者简介：王群丽（1972-），女，山东荣成人，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1.011

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元好问生于山西忻州，但他一生中在忻州安居的时间并不长。元好问初生七月[①]即过继给叔父元格，五岁起随父宦游，稍长又因参加科举、躲避战乱、为官、游历等原因，足迹遍及今天的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北京、甘肃等地。[②]这些经行历览与居留之处都在元好问的诗歌中留下了痕迹。对各地江山胜迹的叹赏、对时节变换的体察，以及草木禽鸟朝晖夕阴引起的感动、苦乐悲欣的情绪体验等等，对诗人而言都是因相对主动的“遇见”所引起的自然的感慨，诗人对这种“遇见”的发生以及对这种“遇见”的反应都掌握着一定的主动性。但聊城[③]是个例外，元好问与聊城结缘的因由比较特殊：因为蒙古兵围攻金人所据的汴京，守将献城投降，他作为战败方的官员被押往聊城羁管，虽不至于到阶下囚的境地，但自由无疑是受限的。

元好问曾先后居聊城县和冠氏县两地：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大约五六月间至蒙古太宗七年（1235）三月，居聊城县，也就是今天的聊城市东昌府区；蒙古太宗七年（1235）三月至蒙古太宗十年（1238）八月，居冠氏县，也就是今天的聊城冠县。[④]聊城县“宋为博州治，金因之”[⑤]，元“初随博州隶东平路”[⑥]。“金冠氏县，属大名府。元初，隶东平路。”[⑦]“元太祖十五年（1220），严实以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浚、滑等户三十万来归，以实行台东平，领州县五十四。”[⑧]元好问居聊期间，聊城县和冠氏县应该同属东平路严实辖地。用今天的地理和行政区划概念来看，这两地都属于聊城市，所以我们将这两者合并起来考察。需要指出的是，元好问在冠氏县的生活状况要好于聊城县，但也并未完全摆脱他的“南冠”身份，所以并不妨碍我们因地理之近、时间上的连续性以及行政归属的统一性而将这两个时期合并讨论。

---

①元好问《南冠录引》：“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继叔氏陇城府君。”见[金]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46页。

②参见郝树侯选注：《元好问诗选》附录《元好问年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120页-147页。

③本文引文中的“聊城”指元好问时代的聊城县，其它部分的“聊城”指今天聊城市的概念。

④参见郝树侯选注：《元好问诗选》附录《元好问年谱》，第137-140页；[金]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典藏本）》附录《元好问年谱简编》，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下册，第1606-1607页。

⑤[清]岳濬等监修，[清]杜诏等编纂：《山东通志》卷三《建置志》，“东昌府”“聊城县”条，[清]永瑢等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39册，第172页。

⑥⑦柯绍忞：《新元史》卷四十六《地理志》，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235页，第236页。

⑧[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册，第1365页。

作为一个诗人，在这样的情形下与聊城相逢，元好问的诗歌对聊城有着怎样的呈现呢？

一、旧金士人

元好问在聊城的生活虽然窘迫，但并不妨碍他接触各色人等，他的诗歌聊城中有不少特色鲜明的人物，他们大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并非普通民众。这些人中与他往从最密、在他诗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旧金士人。元好问《学东坡移居八首》（其八）中说“此州多寓士”[①]，曹得一、李天翼、倪文仲、仲通甫、杨焕然以及姓名不甚了然的季昌、郭侯、赵子、王生等都是暂居聊城的“寓士”。也因为这些寓士，招致了更多旧金士人往来聊城。元好问曾经的汴京同僚，当时已经仕元的徐威卿、已归乡的济南人李彦深、元好问曾“从之问学”的冯璧等，均曾赴聊探访元好问。与他往来的，甚至还有身份较为特殊的金朝世胄完颜仲希、衍圣公孔元措等人。从元好问诗歌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聊城社会中“旧金士人”的情感、生活、社交等方面的细节。

这些旧金士人此前多在汴京生活，靠近政权中心，地位显赫，如《南冠行（癸巳秋为曹得一作）》中描述曹得一的旧金时光：

> 曹侯少年出纨绮，高门大屋垂杨里。诸房三十侍中郎，独守残编北窗底。王孙上客生光辉，竹花不食鹓鹭饥。丝桐切切解人语，海云唤得青鸾飞。梁园三月花如雾，临锦芳华朝复暮。阿京风调阿钦才，晕碧裁红须小杜。长安张敞号眉妩，吴中周郎知曲误。香生春动一诗成，瑞露灵芝满窗户。

门第、宗族、富贵、才华、志趣、交游，可谓样样不俗。元好问《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三）中对自己的“故物”也有详尽的描写，我们从中也颇能窥见诗人从前的生活质量与文化品味：

> 故书堆满床，故物贮满箱。浑浑商宝鬲，累累汉铜章。杖饰昭敬恭，严卯诃瘅刚。雷文绕杖节，兽面出佩璜。私印刻王尊，玉斗蛟龙翔。逸少留半纸，鱼网非硬黄。亦有昙首帖，不辨作雁行。雪景睿思物，宣政旧所藏。晋公古渔父，浩歌濯沧浪。因观宫骑图，卧驼识提囊。溪石含余润，奚墨凝幽香。南荣挂风响，云裾珮铿锵。镜背先秦书，八字环中央。读之三叹息，此日何时光。

描写越详尽，作者的珍爱之意越深。这些商鬲、汉章、杖节、佩璜、私印、玉斗、名家字帖、名画、古镜，细节的精美、来历的不凡、艺术水准的高超，都彰显着其主人的不同凡响，这无疑与作者在聊城时的身份、地位、生活环境极不相称，所以只能是“故物”了。

“青毡持去故家尽”（《赠冯内翰二首》其一），寓士们在聊城的生活是极其困苦的。元好问初到聊城时，衣食不周，“一冬不制衣，缯纩如纸薄。一日仅两食，强半杂藜藿”“儿啼饭箩空，坚阵为屡却”（《学东坡移居八首》其四），住处也很狭窄，“去年住佛屋，尽室寄寻丈。今年僦民居，卧榻碍盆盎”（《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五），日用也是因陋就简，“湿薪烟满眼，破砚冰生髭”（《学东坡八首》其六），“破窗风露深”“家居但疏衾”（《九月初，霖雨中感寒痹作》）。至于“苦寒”“无钱”“我贫”的诉说更是满纸皆是。

汴京富丽奢华高雅的生活作为聊城困窘饥寒日常的言说背景，无疑会进一步加深寓士们对聊城生活惨淡凄凉的体验。作为旧金政权庇护下的士人，金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垮塌崩解，以这种真实、具体、无孔不入又旷日持久的方式作用于他们的人生，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有着强烈的认知。元好问诗中一再感慨的“家亡国破此身留”（《送仲希兼简大方》）、“憔悴南冠一楚囚”（《梦归》）、“金马衣冠一梦中”（《寄钦止李兄》），正是这种认知的体现。家国之恨与身世之悲也往往纠缠在一起，“九死余生气息存”（《秋夜》）、“穷途无用说悲辛”（《喜李彦深过聊城》）、“青山不能隐，俯首入羁鞅。巢倾卵随覆，身在颜亦强”（《学东波移居八首》其五）的感慨也在处可见。

愁苦惨怛中怀念过往的美好与希冀未来能摆脱困境也是人之常情。元好问在聊城时时表达对故乡、亲人以及旧居之处的念想和急于归家的情绪。“草棘荒山雪，烟花故国春。聊城今夜月，愁绝未归人。”（《十二月六日二首》其二）“尘埃嗟落泊，光景强留连。往事青灯里，浮生白发前。”（《癸巳除夜》）“丽川往事浑如梦，信手题诗一泫然。”（《宿神霄北庵梦中作》）“荒村此日肠堪断，回首梁园是梦中。”“旧隐嵩山阳，笋蕨丰馈饷。新斋浙江曲，山水穷放浪。乾坤两茅舍，气压华屋上。一从陵谷变，归顾无复望。樵渔忆还往，

---

①本文所引元好问诗，均从[金]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典藏本）》，下文不再一一出注。

风土梦闲旷。恍如悟前身，姓改心不忘。”（《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五）汴京的繁华，嵩阳旧隐与浙江新斋的的风土闲旷山水放浪，才是士人该拥有的生活元素，一个与逞才济世相伴，一个是安顿身心回归自然必备。然而世事翻覆，这两者都杳然如梦，能够希冀与指望的只有故乡了。故乡是所从来，是可归处，也是亲情的承载之地。“西北并州隔千里，几时还我故乡春。”（《三仙祠》）“阿兄团聚日，曾话百年心。”（《怀益之兄》）“归心江汉日东流。”“白发阿兄应念我，南云寂寞赋招魂。”（《赠周良老》）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既是元好问在困苦中的执念，也是他困窘生活中的光。对亲情的渴念甚至远远超越了他对世事功业和生活环境等等一切外物的追求，成为他的核心诉求：“残年兄弟相逢在，随分畬盐万事休。”（《梦归》）

对归乡的执念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寓士们不被准许或者无力归乡。甚至直到元好问被允许返乡，一些寓士仍未能够离开，《别冠氏诸人（戊戌秋八月初二日）》中说：“他时细数平原客，看到还乡第几人。”寓士们在聊城的自由度大约是有一定限制的。元好问在《济南杂诗十首》其十中说：“看山看水自由身，着处题诗发兴新。日日扁舟藕花里，有心长作济南人。”《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二：“窗明火焙暖，似欲忘拘囚。”字里行间都可看出，诗人在聊城是被羁管者，并没有完全的自由，这也是元好问在聊城极少身心放松之作的原因。但元好问在聊城的生活又有相当的自由度，他甚至获得机会外出，去济南、泰山游玩儿，并留下不少诗篇。由元好问诗歌来看，寓士们在聊城的生活情况大概如下：

物质生活上并非赤贫。一是财产没有完全被剥夺。元好问被孤身押往聊城，其家眷及部分财物应该在与他有姻亲关系的蒙古汉人世侯张柔护持下随后得以至聊城。[①] 所以元好问保有一些书籍和古董字画，自称“我贫不全贫，尚有百本书”（《学东坡八首》其二），“故书堆满床，故物贮满箱”（《学东坡八首》其三）。他大概还有一些旧时的贵重衣物，《秋夕》有“频年但觉貂裘敝”之句。其他寓士，“季昌妙琴事”“郭侯家多书”（《学东坡八首》其八），至少保有琴书旧物。元好问作有《曹得一扇头》诗，此扇应该是文人把玩之扇，《南冠行（癸巳秋为曹得一作）》中有“无人重典骝騮裘”之句，曹得一大概也保有一些旧物。二是在最初的困窘后，寓士们也慢慢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元好问初到聊城，先居佛寺，后租赁民房，“去年住佛屋，尽室寄寻丈。今年僦民居，卧榻碍盆盎”（《学东坡八首》其五），之后又营建三亩茅斋，不但“十口得安居”（《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二），而且有客舍、花栏、菜圃的规划，甚至在屋宅失火后又重新造屋居住。他家子弟能够读书，家中有僮仆，“南荣坐诸郎，课诵所依于。西除著僮仆，休沐得自如”（《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二），生活看起来差不多是小康了。

社交活动不受限。士人之间可以自由往还，他们也时常因会客、聚谈、赏花、宴饮、送别等事由聚会。元好问《喜李彦深过聊城》《徐威卿相过，留二十许日，将往高唐，同李辅之赠别二首》《送李辅之官青州》《纪子正杏园燕集》《别冠氏诸人》都因集会而作。除了这些较为隆重的集会，元好问和寓士们也有一些日常文化交流活动，如听琴、观书、论诗、谈史，“季昌妙琴事，足以相娱嬉。郭侯家多书，篇帙得遍窥。赵子笃于学，间以问所疑。王生旧邻舍，穷达心不移。千里访存殁，十口分寒饥。独有仲通甫，天马不可羁。直以论诗文，稍稍窥藩篱……我作野史亭，日与诸君期。相从一笑乐，来事无庸知。”（《学东坡八首》其八）寓士们日常生活上的往来，也不时见于诗中：倪家酿了酒必定赠饮遗山，“倪家莲华白，每酿必见贻”（《学东坡移家八首》其八）；杨家生子，遗山兴致勃勃去赴汤饼局，“我欲去为汤饼客，买羊沽酒约何时”“更醉使君汤饼局，儿曹他日记通家”（《杨焕然生子四首》其二、其四）；遗山新居落成，也会招邻里相庆，“合欢明日召诸邻，狼藉杯盘从饱吐”（《戏题新居二十韵》）。

主要从事文化活动。元好问《学东坡八首》其一写及自己亲身参与住宅营造的情形，“伐木荒林中，运甓古城隈”，他将之视为卑贱之役，“辱身贱者事，宁当惜筋骸”。他在聊城似乎也并没有从事其它体力劳动。[②] 元好问虽然偶尔也将自己一生中的不如意之事归因于自己所接受的文化训练，“无钱正坐诗作祟，识字重为时所讐”（《雨夜》），也感叹诗文之无益于生存，“长门谁买千金赋，祖道虚陈五鬼文”（《白屋》），但他更多的时候是以自己的文化修养自傲的，也将此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他盛赞友人“东南人物未雕零，和气春风四座倾。但喜诗章多俊语，岂知谈笑得新名”（《徐威卿相过，留二十许日，将往高唐，同李辅之赠

①参见胡传志：《元好问传论》，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180页。

②元好问《中州集序》：“明年滞留聊城，杜门深居，颇以翰墨为事。”可为佐证。见[金]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四，上册，第318页。

别二首》），对诗书风雅的推崇可见一斑。他也颇以自己的诗歌造诣自矜，《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七称："论人虽甚愧，诗亦岂不如。"他在聊城以诗抒怀，也以诗歌与朋友交往：为朋友题扇、题字画，与朋友赏花分韵作诗、送别作诗，与朋友论诗。他的日常生活也不乏风雅况味：听友人抚琴，观友人藏书，作"野史亭"与朋友期集讲论[①]。他甚至也写作史书，[②]"国史经丧乱，天幸有所归。但恨后十年，时事无人知""我作《南冠录》，一语不敢私""造物留此笔，吾贫复何辞"，有着明确的文化担当。他在聊城应该也授徒，并且有可能参与官学事务，《戏题新居二十韵》中称家宅失火，临时借住之处条件恶劣不宜讲学，"由来马队非讲肆，况与兢牢通过路"，新居也用的是学宫之地，且得到官方资助，"学宫分地与闲冷""官给工材半佣顾"。其他寓士的情形大约也跟元好问差不多。

言论自由。元好问初到聊城，对国事念念不忘，痛苦之余，也未尝没有反抗的念头。《甲午除夜》："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秋夜》："秋风一掬孤臣泪，叫断苍梧日暮云。"《送仲希兼简大方》："棋中败局从谁覆，镜里衰容只自羞。"《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五："空悲龙髯绝，永负鱼腹葬。置锥良有余，终身志惩创。"这些诗句望旧金复兴，以孤臣自命，有张良博浪沙之想，但并未给他招惹麻烦。据南宋人彭大雅、徐霆出使蒙古的实地考察，其时蒙古社会形态还比较原始，[③]不可能有管控诗文创作的意识。朱东润先生认为："即使他在诗文中不免有些对于女真的怀念，其实只是笔头上的功夫，在实际行动中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④]也许这正是元好问和旧金士人们能自由表达复金反蒙想法的主要原因。

依附地方权要。寓士们大都得到地方有力者的关照，《戏题新居二十韵》："北来衣冠日枯槁，十九桃符傍门户。"李辅之更是由寓士转为青州官员，没有地方权要的关照，这是不可想象的。《送李辅之官青州》："亲朋离燕日相仍，又向扁舟别李膺。"离燕相仍，则像李辅之一样得到关照，从而离开聊城的寓士应该不在少数。元好问自己初到聊城，也受到蒙古汉人世侯严实等的关照，[⑤]《学东坡移居八首》其四称："聊城千里外，狼狈何所托。诸公颇相念，余粒分凫鹤。"他在冠氏又得到县侯赵天锡资助，才得以营建新居，有了安定的生活。

元好问虽处于"拘囚"困境中，但相比一般意义上的被羁管，或者与那些全无依靠，以至于"混于杂役，随于屠沽，去为黄冠"的"亡金之大夫"[⑥]相比，他的生活环境更为宽松、生活品质更佳。除了严实、赵天锡、张柔的直接关照外，这与耶律楚材保护儒士的政治措施[⑦]、元好问的儒林声望以及他为旧金士人争取生存条件所做出的努力有很大关系。汴京被围，崔立以城降，"自负其有救一城生灵功"，要求城中士大夫为他"立碑颂功德"。[⑧]元好问被迫卷入写碑文一事，足以说明他在当时的文坛地位。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上书耶律楚材，[⑨]请求他蔽护旧金名儒，存续斯文："诚以阁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养之，分处之，学馆之奉不必尽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体，无甚大费，然施之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⑩]书中虽未提及自身，但元好问在聊城的境况与他陈情中所请亦大致相符。总之，时代大潮的裹挟，元好问个人在旧金时代所取得的社会地位，共同导致了元好问在聊城的生活境遇，也直接促成了他聊城时期诗歌写作内容的怀旧基调。

对旧金文人精神意绪、生活状态的抒写是元好问诗歌聊城书写的主要内容，国破家亡的痛苦几乎贯穿他聊城生活的始终，他的真实生活和精神世界几乎都停留在旧金士人的圈子里，裹足不前。

---

①一说，"此时的'野史亭'还在诗人构想之中，有名而无实。"参见张静：《元好问"野史亭"文化意蕴考论》，《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②胡传志：《元好问传论》，第187页："《南冠录》是部家族史兼部分杂史性质的著作。"

③[南宋]彭大雅撰，[南宋]徐霆疏证：《黑鞑事略》（与《和林考》《西北域记》《和林诗》《译语》合刊），《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77册。

④朱东润：《梅尧臣·元好问传》，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19页。

⑤[金]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笺注（典藏本）》，中册，第645页。

⑥[南宋]彭大雅撰，[南宋]徐霆疏证：《黑鞑事略》，第9页，《丛书集成初编》，第3177册。

⑦参见余大钧：《论耶律楚材对中原文化恢复发展的贡献》，《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⑧[金]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十二《录崔立碑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1页。

⑨胡传志：《元好问传论》，第165-171页，对崔立碑事件、元好问上书耶律楚材事均有详尽的分析，可参看。

⑩元好问：《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金]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四，第310页。

二、聊城本土官绅

元好问诗中的聊城本土人物不多，但都是地方名流，诗中提到的冠氏侯、周良老、纪子正堪为聊城本地精英代表。

冠氏侯赵天锡是地方军政首脑，是聊城时期给予元好问帮助最多的人。赵天锡“世为冠氏人”，雅好儒学，喜招揽文士，也富文采，甚至引领了东平行台严实旗下将佐的重儒养士之风。[①] 元好问曾为他作祝寿诗《寿赵受之》：“山东诸将拥行台，共许元戎有雅怀。文字谁如祭征虏，威名人识李临淮。农郊荆棘连新麦，儒馆丹青映古槐。看取邦人祝君寿，五云多处是三台。”对他治理地方的功绩和军事上的成就以及为地方儒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颇多赞美。元好问在冠氏相对安乐的生活多依仗赵侯之力，他最重要，也是最满意的居所，就是在赵侯出资帮助下修建的，就连赵侯的儿子都来帮忙监工。《戏题新居二十韵》称：“去冬作舍谁资助，县侯雅以平原故。贤郎检视日复日，规制从头尽牢固。”元好问自己也不辞辛苦亲力亲为，新宅落成，他极为欢喜，“今晨见此屋，一笑心颜开”，甚至觉得自己省下了一大笔钱财，“买宅必万钱，一钱不天来”（《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一）。他絮絮谈论屋子的大小、房间的分配、屋子的舒适程度、屋前空地的规划，兴奋之余，还夸说自己尚有百本书的大宗资产，拿孟郊作比，觉得自己也不是很贫穷：“谁谓我屋宽，寝处无复余。谁谓我屋小，十口得安居。南荣坐诸郎，课诵所依于。西除著僮仆，休休得自如。老我于其间，兀兀穷朝晡。起立足欠伸，偃卧可展舒。窗明火焙暖，似欲忘囚拘。屋前有隙地，客舍不可无。花栏及菜圃，次第当耘锄。东野载家具，家具少于车。我贫不全贫，尚有百本书。”（《学东坡移居八首》其二）对屋宅的满心欢喜也即是对赵侯的满心感激，他诗中每每将赵侯比作平原君，“县侯雅以平原故”（《戏题新居二十韵》）“他时细数平原客”（《别冠氏诸人（戊戌秋八月初二日）》），就是这种感激的真实流露。

周良老是地方耆旧，应该是旧金的大理寺官员，为人醇厚温和，在任期间多能平反冤屈，十年间考绩都是上等，退居乡里后，治家有方，耕织颐养，兄弟和睦，儿孙满堂，且儿子事父以孝，在外能遇难呈祥，孙子毛骨殊秀，将来一定能高车骏马光耀门庭。周家这一切兴旺祥和的光景，都源于周良老的积德福报。《赠周良老》：“于公断狱多平反，高门大车在乃孙。我居聊城欲二载，喜见周叟醇而温。十年大理书上考，宜有阳报如于门。大儿书来问安否，兵饥不死天所存。郑孙毛骨殊秀发，宝气郁郁含朝暾。机声呕哑聒朝昏，种瓠五石当酒尊。是翁福禄知未艾，昆弟和乐连株根。白发阿兄应念我，南云寂寞赋招魂。”周良老的为人，为官理念、政绩，治家成效让遗山十分心仪，所以认定他福禄未尽，宜有阳报，并由周家的兄弟和睦，转而思念自己远在南方的兄长。好的楷模对周围的人必定产生感染力，遗山在聊城县两年，已经为周良老的为人处事所动，这样的良绅必定也有助于教化地方民众。

纪子正在冠氏城西边种了很大一片杏园，约有千株，“纪翁种杏城西垠，千株万株红艳新”（《纪子正杏园燕集（甲午岁）》），“闻道纪园千树锦”（《冠氏赵庄赋杏花四首》其四）。杏花开时极美，主人亦风雅好客，广邀邑中文士，游赏宴饮唱和，而且大约已相沿成习，成为文士们的固定集会。“阳平一邑多诗豪，主人买酒邀众宾。花时有成约，恨少杨子张吾军。”一时盛况，遗山以为堪比杜甫所描写的三月三日杨贵妃姐妹出行曲江，“五家合队虢与秦。曲江江头看车马，十里罗绮争红尘”（《纪子正杏园燕集（甲午岁）》）。这位纪翁应是地方大户，虽不一定有多高的文化修养，但至少尊重文人，喜好交接儒士，对地方文教是有积极作用的。

另，元好问集中有《觅神霄道士古铜爵》《宿神霄北庵门中作》，一说神霄道士姓何，居聊城[②]，详情未知。

---

①[金]元好问：《千户赵侯神道碑铭》，[金]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五，中册，等528页：“侯在军旅中，日以文史自随，延致名儒，考论今古，穷日夕不少厌。时或投壶、雅咏、挥麈清坐，倡优、杂戏不得至其前。又子弟之可教者，薄其徭役，使得肄业，而邑文人亦随而化之。行台所统百城，比年以来，将佐令长皆兴学养士，骎骎乎齐、鲁礼义之旧。推究源委，盖自侯发之。”

②[金]元好问著，狄宝心校注：《元好问诗编年笺注》卷四，中册，第606页。

三、聊城风物

元好问以南冠身份居聊，聊城对他而言，自然缺少亲和感和吸引力，初至聊城时的感念旧国、关心时事、生活窘迫、潜心著述以及他文化精英的自我定位、对汴京繁华的怀念和对曾经的台省身份的自矜，都使他对穷乡僻壤的聊城的风土人情缺少深刻的体察和书写的兴趣，其诗中所提及的聊城景物也大都萧索无聊，愁闷惨淡。《南冠行（癸巳秋为曹得一作）》:“荒城雨多秋气重，颓垣败屋深茅营。”《秋夜》:“萧条门巷似荒村。”《梦归》:“黄叶潇潇风雨秋。”《乙未正月立春》:“一冬残雪不肯尽，连日苦寒殊未涯。”以上诗句描写秋冬景象，其寒荒还可以归因于季节因素，但即便是描写春景的诗句，也大多看不出半分喜乐。《三仙祠》:“吹残芳树红仍在，展破平田绿已匀。”“残”“破”二字一出，春之生机与活力即扫荡殆尽。《徐威卿相过，留二十许日，将往高唐，同李辅之赠别二首》其一:“荡荡青天非向日，萧萧春色是他乡。”“荡荡”有空阔之感，“萧萧”一词有清冷之感，以之形容春色亦是极罕见的用法。如此荡荡萧萧的春日光景自带疏离感，让人无法亲近。元好问笔下的聊城月，也是惹人离愁的，《十二月六日二首》其二“聊城今夜月，愁绝未归人”，全无月之形貌，只有赋人以愁之功能。移居冠氏后生活相对安定，他笔下的聊城风物也逐渐有了明朗的色调。《自赵庄归冠氏二首》其一“春华澹澹晓寒轻，野草摇风半白青”，其二“杏园红过雪披离，杨柳无风绿线齐”，都色彩鲜明，富有春天的美感。这种变化正如王国维所言，“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①，遗山笔下的聊城景物是他此一时期心绪的写照。

杏花和酒是元好问赞美最多的聊城物产，甚至他离开聊城之际所作《别冠氏诸人（戊戌秋八月初二日）》，开篇即点出这两者:“东舍茶浑酒味新，西城红艳杏园春。”元好问素爱杏花，平生写作杏花诗甚多。冠县“河流膏润”“土宇丰饶”，② 适宜林木生长，至今仍是农林生产发达之地，杏树于此的种植生长大约也是得其所哉。元好问笔下的冠氏杏园非止一处，上文提过，纪子正杏园杏树“千株”，较为壮观，冠氏赵庄杏花的规模也不小，“文杏堂前千树红”（《冠氏赵庄赋杏花四首》其二），元诗中也提到过不知名的杏园，包括居于聊城县时期的“城外杏园”（《聊城寒食》）和《自赵庄归冠氏二首》中的杏园。美和发现美的眼光交汇一处，纪子正的热情好客又为美的欣赏铺垫了路径，元好问的杏花诗写作在《纪子正杏园燕集（甲午岁）》中有了不同寻常的爆发：

> 纪翁种杏城西垠，千株万株红艳新。今年寒食好天色，晓气郁郁含芳津。天公自爱此花好，朝薰暮染烦花神。融霞晕雪一倾倒，非烟非雾非卿云。未开何所似？乳儿粉妆深绛唇。能啼能笑痴复呆，画出百子元非真。半开何所似？里中处女东家邻。阳和入骨春思动，欲语不语时轻颦。就中烂漫尤更好，五家合队虢与秦。曲江江头看车马，十里罗绮争红尘。阳平一邑多诗豪，主人买酒邀众宾。花时有成约，恨少扬子张吾军。落花着衣红缤纷，四坐惨淡伤精魂。花开花落十日耳，对花不饮花应嗔。爱花常苦得花晚，争教行乐无闲身。芳苞一破不更合，且看锦树烘残春。

不但篇幅规模甚巨，而且诗中杏花、赏花人、主人形象皆美甚，将一场小县城的花事写得如同通都大邑的赏花盛会，杏花如出仙圃，看客如同京中贵族，主人也豪爽风雅，遗山甚至流露出了聊城数年中难得的行乐意识，“争教行乐无闲身”。诗人完全回归生活本身，挣脱了身份枷锁，沉浸于对美的体察之中，对杏花的描摹细致、深情，是真正地写花，写一场赏花欢宴，而不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元好问的杏花之爱，在聊城县时已有表露。《徐威卿相过，留二十许日，将往高唐，同李辅之赠别二首》其二“别后相思重回首，杏花尊酒记聊城”，已经用杏花和酒来标记聊城。《聊城寒食》:“轻阴何负探花期，白发于春自不宜。城外杏园人去尽，煮茶声里独支颐。”诗中虽有淡淡愁绪，但对杏花的牵挂与未能探花的怅然极为真挚。冠氏期间诗人开始专程探访杏花，着意描绘花容美色。《冠氏赵庄赋杏花四首》其一“一树生红锦不如，乳儿粉抹紫襜褕”，其二“文杏堂前千树红，云舒霞卷涨春风”，其三“锦树烘春烂不收”，花色都极为绚烂，不输江南江北古往今来任何杏花。甚至在繁花似锦的描绘中，诗人开始体察杏花的处

---

①王国维著，徐调孚、周振甫注，王幼安校订:《人间词话》（与汎周颐著，王幼安校订《蕙风词话》合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191页。

②[清]岳濬等监修，[清]杜诏等编纂:《山东通志》卷七《形胜志》，“东昌府”“冠县”条，[清]永瑢等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39册，第330页。

境，“看花人自为花愁。荒蹊明日知谁到，凭仗诗翁为少留”，这种体贴，充满对美的爱惜之情。其四“谁道东风太狂生，次第开花却有情。闻道纪园千树锦，一尊犹及醉清明”，诗人庆幸于东风有情，使各处杏花次第开放，因而能与杏花共处至清明，对杏花的留恋与不舍溢于言表。

酒也是元好问聊城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友朋相聚，排遣愁闷都离不了酒，“浇愁欲问东家酒”（《秋夕》），“百年世事兼身事，尊酒何人与细论”，“安得酒船三万斛，与君轰醉太湖秋”（《南冠行》癸巳秋为曹得一作）。生活中点点滴滴的温情与畅快也都与酒相关：“倪家莲花白，每酿必见贻”（《学东坡移居六首》其八），“我欲去为汤饼客，买羊沽酒约何时”“更醉使君汤饼局，儿曹他日记通家”（《杨焕然生子四首》其二）。但酒与杏花结合，方才有了鲜明的聊城印记：“别后相思重回首，杏花尊酒记聊城”（《徐威卿相过，留二十许日，将往高唐，同李辅之赠别二首》其二）。纪园赏杏更是与饮酒相伴，“闻道纪园千树锦，一尊犹及醉清明”（《冠氏赵庄赋杏花四首》其四），“阳平一邑多诗豪，主人买酒邀众宾”“花开花落十日耳，对花不饮花应嗔”（《纪子正杏园燕集（甲午岁）》）。纪园的杏花与酒给元好问留下了如此美好的记忆，以至于他将聊城本地酒命名为“杏园春”，并特地写诗赞美聊城酒的酿法高妙，酒味儿醇美，色香俱佳：“我爱阳平酒，兵厨酿法新。白金难着价，一盏即醺人。色笑榴华重，香兼竹叶醇。为君留故事，唤作杏园春。（杏园，指纪子正家园为言。）”（《续阳平十爱》）他在《跋〈酒门限邵和卿醉归图〉（邵伯禄之父）》中称“好着蹇驴驮我去，与君同醉杏园春”，“杏园春”既是可醉之酒，也是可赏之春。元好问的赞美也并非虚誉。聊城地土肥厚，土地平旷，适宜耕作，农作物产量高，水资源也极为丰富，有着极好的酿酒条件。今天的冠县也有品质上佳的冠宜春酒，1991年曾获第二十九届布鲁塞尔国际优质产品金奖。

要之，杏花与酒是元好问诗中聊城风物的典型代表，花与酒背后连结着浓厚的人情，是元好问聊城书写中纯粹属于聊城的最美好的一部分。

结　语

元好问被“攘臂留空橐”（《学东坡移居八首》其四）驱往聊城，同僚旧识同行者多，结邻而居，日相往还，且时常有附近的旧友来访，共话往昔，这使得他的身心几乎一直停留在汴京生活圈子，耽于故国之思，旧游之念，并未有接纳和探索欣赏聊城的主动性。他在聊城的生活也主要是文士模式，所交游往来的几乎全是文人，对聊城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甚少留意。都是流寓他乡，但政治人事背景不同，元好问诗中并没有杜甫成都时期诗歌的风土人情，也没有东坡贬谪诗中的底层民众形象。但元好问在聊城得到地方长官冠氏赵侯的关照，也受到纪园主人的热情款待，周良老的为官处事理念也引起他的共鸣，这使他的诗歌有对聊城“人美”的书写，并由“人美”进一步发现了“物美”，不论是“杏花尊酒”的旧友还是“杏园春”的新谊，元好问的聊城书写中，风物之美都有浓重的人情之美的痕迹。

Liaocheng Writing in Yuan Haowen's Poems

WANG Qun-li

(School of Litera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Yuan Haowen was detained and governed in Liaocheng for six years. But his body and soul still stayed in the circles of Bianjing. He missed the defeated Jin Dynasty and the life which once belonged to him. He didn't care the customs and social features of Liaocheng. His poems mainly focused on the living and spirit of the literati from the defeated Jin Dynasty in Liaocheng. However, Yuan Haowen also got a lot of help from the local governor Zhaohou of Guanshi(冠氏), warm hospitalities from the host of Jiyuan(纪园), and was impressed by Zhoulianglao's philosophy of official and life. All of this were the source of writing about the beauty of hunman heart. And further, he found the beauty of things. Whether *Xinghuazunjiu*(杏花尊酒) or *Xingyuanchun* (杏园春), we always could find thick trances of human heart beauty from the things beauty.

Key words: Yuan Haowen; poems; Liaocheng

[责任编辑　山阳]